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衡量世界上穷人景况的指标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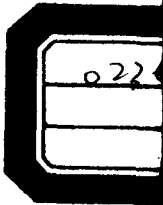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责任编辑: 孙学琛

90.



**衡量世界上穷人景况的指标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0千字

1985年 3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全年出版40期 总定价: 12元

编者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应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的唯一指标，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特别是不能确切衡量占一个国家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本书作者提出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概念，它包括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三个成份。作者认为，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补充，可以更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作者也承认，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概念远非已经完善，还需要继续发展。

原书共七章，篇幅较长，本刊仅摘译其中的序和一、二、四、六章，以供参考。

目 录

序.....(1)

第一章 引言：需要有一个新的指标
.....(2)

第二章 国民生产总值：它能衡量什么和不
能衡量什么..... (9)

第四章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组成部分：为
何采用这些组分？.....(18)

第六章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说明什么？.....(34)

衡量世界上穷人景况的指标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美〕 M.D.Morris

序

近年来，发展战略的目标已转向确保更有效地解决人类的基本需要，同时增加物品的产出。因此，人们不遗余力在制定一些指标，使这些指标在衡量物质福利的进步方面，比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货币指标更为有效。物质生活质量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简称PQLI）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由海外发展委员会在M·D·摩里斯博士指导下制订的一种指标，它可以衡量物质福利的程度，而且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同人均收入指标一起使用。

自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初次以扼要和初步的形式出现在海外发展委员会的年度评价“美国和世界发展：1977年议事日程”中以后的两年时间，广泛的公开讨论已表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是一项扎实的革新，只需要作微小的修改。本书的撰写曾得到美国国际发展处的资助，书中的分析曾得益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首次出现以来的国际讨论。

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实体，无论是公立的或私

立的,都已采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作为一种实用的衡量手段,这表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既能满足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有它的未来前途。然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充分利用尚有待发展。显然,有关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以及它的应用范围如何,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为了确定政策和计划干扰对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影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计划工作者今日仍相信,在改善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比在改善社会指标(包括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三个成分: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方面,他们更有能力根据一定投入来预测产出结果。在社会进步的规划方面,还没有出现一种可与“生产函数”(经济学家用以使国民生产总值投入与产出发生联系的手段)相比的东西。有关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所涉及的概念以及进一步提高其效用的意义,欢迎批评指正。

海外发展委员会主任

J · P · 格伦

第一章 引言：需要有一个新的指标

鉴于对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面向增长战略的结果感到失望,无论富国或穷国都对满足世界上最穷的人的最低需要的可能性重新发生兴趣。联合国及其各个部门(特别是国际劳动局)、世界银行、罗马俱乐部和美国国会都曾表示遇到挫折。目前在广泛探索另外一些替代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对公平的强调至少像对增长的强调一样。它们日益

受到苏塞克斯大学的发展研究所、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学者的注意。

这种方向的改变意味着回到较老的经济学思想：强调相对的生产要素价格、节约稀缺的资源 and 更多地使用比较丰富的资源。这种方法又需要寻求较为切合实际的技术。对于穷国来说，这意味着这些技术使单位资本使用比发达国家通常所用的更多的非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新的战略往往更致力于人民的参与以及更多地依靠当地的机构和土生土长的概念系统。某些人把公平看成是所要获取的一个目标，可以以牺牲若干增长为代价。另外一些人把它看成是任何人道的增长战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份，但不是是一个足够的成份。

新的方法（无论称为公平的增长或人类基本需要或人类最低需要）是兜了一圈，回到原位的发展战略。“农村发展战略”、“整体发展”和“参与”等，过去都已听说过。这些思想是如何出现的或如何重新露面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公平和满足人类基本的或最低的需要应摆在非常高的优先地位。对这些目标，连口惠而实不至都做不到的战略，在资源审计员的讨论会里或在国际舞台上或在穷国里都不会有合法地位。

不管这些战略是现实还是一时的风尚，不管它们的目标是认真的指标还是口号，它们却提出了过去从未考虑过的事：不仅需要衡量总的经济产出和该产出的构成，而且也需要衡量产出是如何分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最广泛地

被承认的用以衡量进步的尺度。然而，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和各国之间的总的经济成绩，但是它不能显示产出是如何在穷国（或在富国）的人民之间分配的。鉴于穷国的发展计划工作者和资助国的援助分配者现在更直接地集中于那些强调利益分配的计划，他们不但需要新的制订规划的战略，而且也需要另外的度量系统。

在海外发展委员会出现度量问题并非由于它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抽象的局限性有兴趣，而是为了应付该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所关切的两个政策问题。根据有关变通发展战略的某些早期研究工作，显然，不管穷国发展如何迅速，经济增长却不能使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有任何显著提高。估计表明，低收入国家（按一九七五年美元不变值计算，人均收入为二百五十美元或更少的国家）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只能盼望它们的实际人均收入平均从一九七五年的一百五十美元提高到二〇〇〇年的三百二十七美元。这对于改善至少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最贫穷的人的生活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在首次取得这一教训的同时，海外发展委员会的两位成员——该委员会主任 J·P·格伦和我（当时为特邀委员）——参加了国家科学院的世界食物和营养研究，它是根据福特总统的指示而进行的，任务是确定美国如何能协助缓解“全世界今后几代人将面临的长期短缺食物和营养不良的严酷前景。”12号研究小组的结论是，仅仅提高食

物供应、热量摄入或人均收入并不能取得营养上的成效——定义为使人民的寿命更长、更为健康和生活更为令人满意。显然，物质福利的改善是生理、心理、营养、医学、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对于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人们差不多一无所知。

该研究小组的资料表明，虽然在人均收入的水平和长寿、健康、识字率等之间存在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在某些国家里并不明显。此外，存在突出的例外。某些人均收入相当高的国家，其成绩很差。另外一些人均收入十分低的国家却具有相当高的识字率、长的预期寿命、低的婴儿死亡率和低的死亡率。一些国家已为它们的处于差不多任何收入和热量消费水平的人民取得了这些不同的生活质量。要取得所期望的结果，看来既有较为有效的方法，也有效率较差的方法。低收入例子对研究小组特别有启发，因为它们意味着，一些发展战略的正确结合有可能使其他极穷的国家较迅速地改善条件。

海外发展委员会着手为实现这一可能性所出现的问题寻求答案。第一步是寻求一个有助于确定这类“成功”事例的衡量标准。它必须是不管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结构差别如何而都能行得通的一个衡量标准。过去，一些机构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曾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工作极为复杂，它们都失败了。

我们吸收了他人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在一个衡量标准

里包括发展过程的一切内容。在解决最穷的人的需要方面，我们确定了某些被认为取得成功的发展政策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我们最后决定了三件显然普遍关心的事。我们认为人们一般希望他们所生的婴儿很少死亡以及人们在差不多任何情况下都愿意活得长寿一点。我们也认为，识字可以代表个人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最终选择了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基本识字率这三个指标作为综合衡量标准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组成部分。其中每个指标满足在开始时已确立的一个综合指标所要求的六项准则。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具有非常有限的目标。它并不试图全面地衡量“发展”，它也并不衡量自由、公道、安全或其他无形物。然而，它确实试图衡量社会如何满足某些为生活服务的社会特色的成效。它不仅能衡量国家一级的变化，而且也能在男女之间以及在其他不同的社会、种族、地区或部门的集团之间进行比较。它能衡量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任何指数的实用性取决于数据的精确性及其可获性。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一个优点是，它所利用的数据即便在尚未建立复杂的官僚政治的基础结构的国家，为了基本的行政管理目的，也是需要的。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迄今所关心的是这一概念究竟有无前途。因此我们利用了现有的、而往往是不完善的数据，而不是等待数据收集的改善。这也

是本研究没有打算致力于解决所涉及的理论上的一致性和因果问题的原因。

一种衡量手段的出现而没有理论根据，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不符合规定的科学方法：促进一种手段的动力来自已有的理论。这一问题容后再讨论，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即使没有一个详尽的、明确的理论基础，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可帮助决策人更清楚地看到某些事物。第二，虽说没有理论，不能有把握地开出政策处方，这确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所独有的一个缺陷。正因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或变化率不能很好地说明发展中国家里实际出现了什么利益或谁获取了这些利益，结果才发展了这一指数。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本身虽然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它却指出了分析家们几乎必须遵循的路线。它指出了有可能在大大低于决策者或理论学家一般所认为可能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下取得较好的某种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概括了影响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的一些政策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它意味着，集中于个别的成分不能取得有效的结果。把相互影响的相辅相成的一些政策综合在一起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问题是，尽管我们开始有所认识和有了某些假设，我们尚不知道这些相互关系是什么。探索这些相互关系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为何我们没有把这项任务作为我们的初始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许多团体和个人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进行工作。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提出了一个涉及营养、保健、教育、参与社会的程度、就业水平和获得收入的能力等的全面平衡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学者们长期来曾设法回避它。

最初形式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只有很少的理论基础说明。我们曾希望大家提出批评意见，结果没有使我们失望。有表示赞同的反应，也有严厉的批评。我们从后者得到了教训，从前者得到了鼓励。这次对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较详尽的讨论就是其成果。以下各章罗列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赖以为基础的一些假定。其中研讨了建立任何这种指数的技术问题，能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获得的见识，该指数的用途以及为增加它的效用所需要进一步进行的工作。

人类喜爱分类学，而关心发展问题的人们看来特别为分级和分类所吸引。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最初说明曾引起注意，部分原因在于它允许分级分类；一位评论家曾指责该指数为“不过是一种高谈阔论的玩意而已”。然而，分类当时并不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主要目的，现在也不是它的目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专门探索一些可以加快改善极度贫穷的条件战略，其改善的速度要比只是等待国民收入的提高而福利“自然而然地”会到来的战略所期望的速度快。许多人已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可能仍有某些人认为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概念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希望这一研究将促进他们沿着其他路线重新开

展工作。

只对本研究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第四章（讨论用以选择组分指标的准则）、第六章（讨论该指数的应用）和第七章（以目前的工作情况为基础的结论和有关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第二章 国民生产总值：它能衡量 什么和不能衡量什么

国民核算制及其构成部分（概括为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唯一最成功的社会科学手段。它是进行社会诊断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既可用以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也可应用于一个国家。当在人口的规模方面进行调整时，国民生产总值曾广泛应用于衡量各国在一段时间内的成就以及用以比较各国的成就。

作为一种衡量手段，国民生产总值不是没有缺点和内在矛盾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的读者可以知道，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种衡量成就和福利的标准，存在某些局限性。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人们，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用于比较各国之间、特别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成就时所存在的局限性，甚至更为清楚。某些使用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可能过分热衷于它的能力，但是某些最积极参与它的发展工作的人对于它的一般缺点最了解，对于它的局限性最熟悉。

虽然补救这些缺点的工作继续在进行，但是显然，国

民生产总值不能囊括社会行为的所有特征。在应用于某些目的时，特别是用以衡量欠发达国家在福利方面的成就时，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辅之以其他指标。

国民生产总值的局限性

即使在一个现代的货币化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衡量总福利的一个标准。它用货币价值衡量货物和劳务。许多生产性活动被排除在外，例如家庭主妇的工作以及围绕家庭所进行的“亲自动手”的活动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国民生产总值包括某些活动，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活动不应包括在内（例如城市地区的治安警卫），因为这些活动可以被看作城市生活的一种代价，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必需物”。

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衡量一些主观因素——一个社会所提供的幸福、公道、安全、自由或余暇的程度。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当初的打算衡量的对象，没有理由要求它必须满足对这些因素的衡量。同样，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质量——具有代表性的如它的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和识字率。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任何水平或国民生产总值的任何增长率和这些指标所衡量的成就之间没有自然的和直接的联系。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可以在各部门之间和在各社会团体之间以各种方式进行分配。一个国家的政策可以强调其军事力量的增长和它的某些对于人民的健康和福利的改善没有明显或直接帮助

的经济部门的增长。

在一段时间内，个人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不一定能改善福利。一个社会的最贫穷的集团可能从收入的不断提高中得不到多大的好处或者完全没有好处；某些集团可能遭到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之苦。即使最贫穷的集团分享到不断提高的收入，这也不能保证这些收入用于改变热量摄入量或改善人民的总福利或物质福利；例如，在某些社会中，伴随收入的不断提高而来的是有害的食谱变化，又如差不多所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都不得不支付各种环境污染的代价。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甚至可以在不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而通过某些变革——改善安全、社会和谐、机会、寿命或死亡率——而使生活过得较好。

经济学家们未曾忽视国民生产总值所带来的困难。例如，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詹姆斯·托平（James Tobin）曾进行过大量的工作以把国民生产总值转变为一种衡量经济福利的标准。

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它是一个生产指数，而不是消费指数。经济活动的目的毕竟是消费。虽然这是经济学的中心前提，但是这一专业无论在概念上或在统计上，针对广义的和仔细计算的消费的一种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的发展工作曾是缓慢的。我们已建立了一种初步的和实验性的“经济福利的量度”（MEW即“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我们试图在其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福利之间的明显矛盾考虑在内。

诺德豪斯和托平在建立MEW时，在以下三个主要方

面修改了现有的国民核算制：一、他们对支出重新进行了分类；二、他们估算了消费资本的服务（services of consumer capital）、家务活动和余暇的价值；三、他们调整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某些不愉快的事。

该建议曾引起很多争论。某些批评它的主要评论家害怕这种修改将削弱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种衡量生产的标准的效用，同时使公众误以为国民生产总值可衡量社会福利。不管诺德豪斯和托平的建议的命运如何，人们普遍同意，目前形式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衡量福利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此外，国民生产总值特别不适于衡量在一段时间内的福利。莫赛斯·阿布拉莫维兹（Moses Abramovitz）在一篇广泛被引述的论文中断言，虽然国民生产总值肯定是迄今所设计的衡量产出的最好的标准，但是“我们必须对下列观点深表怀疑：福利增长率的长期变化可以大致根据产出增长率的变化加以测定。”

旦·欧歇（Dan Usher）曾指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特别不正常的特点。目前计算经济活动的方法意味着，当人均收入由于人口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而下降时，福利有所下降。然而，如果人口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而有所增加，则人们大概会觉得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可以预期活得更长寿。例如，在加拿大，每一千个出生婴儿的死亡率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从大约一百下降至二十，而一岁至四岁的儿童的死亡率从千分之十下降到千分之一。欧歇给这样的预期寿命的提高指定一个